

改組後中國國民黨中央派系 之爭對美洲黨部的衝擊 (1924-1927)： 以三藩市總支部為例

陳穎賢*

一九二四年國民黨改組所後衍生的派系紛爭，一直是治國民黨史的重要課題。然而相關的研究成果多將視角聚焦於國內，海外黨部與國內中央黨部之間的互動關係仍未受到研究者普遍重視。因此，本文以國民黨美洲黨部——三藩市總支部為觀察主體，先概述國民黨美洲黨部之發展進程，指出美洲黨務的推進及三藩市得以成為總支部所在地，林森於其中扮演著關鍵角色。次之，本文將討論三藩市總支部因國民黨改組所遭遇之衝擊，說明三藩市總支部在西山會議及寧漢分立時期所作出之抉擇。最後，本文嘗試比較改組後國民黨國內一般黨部與海外黨部之群眾基礎，指出國民黨海外黨務必然以「華僑社會」為其活動空間，而華僑即是海外黨部之群眾基礎。

關鍵詞：中國國民黨海外黨部、三藩市總支部、西山會議、寧漢分立、派系、華僑社會、華僑

*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碩士生。

一、前言

孫中山逝世後，蔣中正、汪兆銘、胡漢民之間的領導權之爭，一直是研究國民黨史的重要議題，且學界對此議題已有相當豐碩的研究成果。¹此外，西方學界就國民黨組織結構與黨政關係也多有琢磨。David Tsai 認為，清黨後南京中央政府與各省地方黨部一直處於競爭狀態，並由此衍生為蔣、胡、汪的派系之爭。²然而，上述研究成果，多琢磨於蔣、汪、胡個人及其派系間的合縱連橫，抑或著重南京中央政府與地方省黨部之間的黨政衝突，皆忽視了國民黨海外黨部在中央高層派系之爭中扮演的角色與意義。儘管，學界就中華民國的僑務政策已有豐碩的研究成果。但其研究多聚焦於僑務政策的變遷及內容，且特別強調華僑捐款與中國革命的關係、華僑金援祖國建設、及華僑對日抗戰等僑務政策的建設面，而忽視執行方海外黨部的分歧性與對中央的疏離。³雖已有學者提及國民黨海黨部的分歧性，但相關研究仍未能充分討論海外黨部與中央派系之爭的互動關係。⁴然而，隨著史料的開放，已

¹ 金以林，《國民黨高層的派系政治：蔣介石“最高領袖”地位是如何確立的》（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

² David Tsai, “Party-Government Relations in Kiangsu Province, 1927-1932,” Selected Papers from the Center for Far Eastern Studies, no. 1, 1975-76., pp. 85-118.

³ 李盈慧，《華僑政策與海外民族主義（1912-1949）》（臺北：國史館，1997）。

⁴ 陳三井將改組後歐洲國民黨黨員分為左、右派，相較於國內黨部，左派與加入國民黨的共產黨員於法總支部占有大多數席次，且主導了法國總支部。詳文可參考：Chen San-Ching, Communist-Leftist Control of the European Branch of the Guomindang, 1923-1927, Modern China, Vol. 22 No. 1, January, 1996, pp. 62-91. 此外，Yong. C.F. 的研究指出，國民黨在新馬地區的海外黨員，有左派與溫和派（moderates）之別，左派黨員在廣州派遣的主要幹部（Main School）組織下，於英屬新加坡佔有主導性的地位。詳文可參看：Yong. C.F. The Kuomintang movement in British Malaya 1912-1949 (Singapore: Singapore University Press,

有研究指出中國政局與中央黨部的派系紛爭，對海外黨部具有一定程度的影響。⁵但現有的研究卻未論及1924年國民黨改組對海外黨部造成的影響。

因此，本文試以三藩市總支部為例，先論述該總支部之發展脈絡，並指出林森於其間扮演著關鍵性的角色。復次，本文將討論1924年國民黨改組後，國民黨中央的派系之爭如何對三藩市總支部造成影響，從而揭示三藩市總支部在西山會議與寧漢分立時期的政治動向，並對三藩市總支部與國民黨中央派系之爭的互動關係提出說明。最後，本文將反思國民黨海外黨部與國內一般黨部之異同，揭示海外黨部於中央派系之爭中的歷史意義。

二、三藩市總支部的成立與發展

（一）三藩市總支部之確立

中國國民黨美洲黨部，隨著興中會、中國同盟會、國民黨、中華革命黨、與中國國民黨的改制而一再更易。然而，興中會時期，孫中山雖親歷美洲各埠，但受美洲保皇黨勢力鉗制，黨務推展並不順利。⁶但隨著中國同盟會在東京成立，並經孫中山赴美宣傳，美洲黨務才日形發達。⁷辛亥革命後，國民黨美洲各埠黨部皆

1990), pp. 83-105. 另外，麥禮謙以美國僑社出版之中文報刊，論及美洲國民黨的黨務活動及派系之爭，亦是本文重要參考。麥謙禮，《從華僑到華人——二十世紀美國華人社會發展史》（香港：三聯書店，1992），頁186-200，204-230。

⁵ 張順良，〈改組派與國民黨中央海外黨務組織爭奪戰初探〉，《花蓮教育大學學報》23（花蓮，2006），頁331-356；陳國維，〈抗戰前中國國民黨駐美黨部與國內政局〉（南投：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歷史學系研究所，2010），碩士學位論文。

⁶ 麥謙禮，《從華僑到華人——二十世紀美國華人社會發展史》，頁186-191。

⁷ 鄒魯，《中國國民黨史稿》，第一冊（北京：中華書局出版，1960），頁102；又見杜元載，《革命文獻》，第六十五輯（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

依循國民黨成立而改制。但此時的國民黨美洲支部仍無有效的籌劃機關，遂於二次革命後，國民黨美洲支部即提呈「修正國民黨美洲支部規約草案理由書」，調：

我國民黨今日之存亡問題。已非法律可以解決。而決為武力乃可以解決也。故刷新黨勢。改良黨規。為我美洲支部不容再緩之舉。蓋國體之能進步。全賴精神之能振發。而精神之可得而表示者。則人心團結。機關靈通二者是也。……今北京本部及分各省支部分部。縱經袁賊之摧殘。為形式之解散。然吾黨理事長孫中山先生猶在。而為全黨之指揮也。獨是美洲團體散處各埠。苟無統一之制度。殊難期一致之進行。感情不相屬。則痛癢不相關。人自為謀。各持一見。天下無可為之事也。本支部為此之懼。僅將原有規約。參酌時宜。略為改定。……至於目的之所在。則謀一致之進行。定統一之制度。期毋背焉可也。⁸

儘管，於中國同盟會時期，美洲支部即以三藩市為總機關。⁹但從上述修正草案理由書可反映，該總機關仍無法有效統籌各埠。因此，為了使機關靈通，特別提呈上述規約草案，將美洲支部定名為「國民黨美洲支部」，並規定「本支部設於美洲加利寬省三藩市。若因事件之必要。或經各分部過半數之要求。可以設立於別埠」。¹⁰此外，三藩市支部更制訂「國民黨美洲支部施行各埠分部

委員會，1974），頁507-512。

⁸ 鄒魯，《中國國民黨史稿》，第一冊，頁146-147。

⁹ 鄒魯，《中國國民黨史稿》，第一冊，頁50、102；另見杜元載，《革命文獻》，第六十五輯，〈中國同盟會美洲三藩市總會章程〉，頁96-106。

¹⁰ 鄒魯，《中國國民黨史稿》，第一冊，頁147-151。

通則」，以重整美洲各埠組織，並強化美洲各埠與三藩市支部的聯繫。¹¹因此，儘管三藩市支部早被選為國民黨美洲黨部的總機關，但出於機關靈通之需，而不得不再三強調三藩市於美洲各埠之統籌地位。

此外，上述修正草案理由書亦反映，二次革命前，孫中山一直是國民黨美洲支部所效忠的領袖。但此時執行美洲黨務改組的負責人並非孫本人，而是由東京中華革命黨本部派往美洲的林森與馮自由。¹²據馮自由自述，代理三藩市正支部長辦理美洲黨務期間，先後接到孫中山三件命令：一、為通令各埠黨部，取消國民黨名目，自後一律改稱中華革命黨；二、海外國民黨員須一律重新填寫中華革命黨誓約及加蓋指模；三、海外各部應即設立籌餉局，以為起兵討伐袁世凱之需。¹³對於改組中華革命黨與設立籌餉局，馮奉命惟謹。但取消國民黨名義，卻引發美洲各埠爭論。最後為了籌餉之便與避免外人藉口干涉，國民黨美洲支部乃得孫中山特許，以英名Chinese Nationalist League（即國民黨）在美註冊成為法人團體，並以此作為國民黨在美洲黨部之英名統稱。¹⁴如是，國民黨美洲支部在林森與馮自由主持下，黨務日趨發達，中華革命黨總務部，即將美洲各埠黨部、美屬檀香山、歐洲利物浦、及英屬加拿大各埠黨部，皆劃歸舊金山支部統籌。¹⁵至此，三藩市

¹¹ 鄒魯，《中國國民黨史稿》，第一冊，頁151-157。

¹² 羅家倫，《革命文獻》，第五輯（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1954），頁60。

¹³ 羅家倫，《革命文獻》，第五輯，頁62。

¹⁴ 羅家倫，《革命文獻》，第五輯，頁62-63；另見李雲漢、林養志，《中國國民黨黨務發展史料：組織工作（上）》（臺北：國民黨黨史會出版，1993），頁48-49。

¹⁵ 黃季陸，《革命文獻》，第四十五輯（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1956），頁441-442。

作為國民黨美洲總支部之地位可謂正式確立。

（二）林森與三藩市總支部

1. 統合國民黨美洲黨務

三藩市之所以成為國民黨美洲總支部所在，除了制度劃一及林森、馮自由二人之策動，地理因素及林森向孫中山薦舉，亦尤其關鍵。對此，於「林森陳達三上總理書」中可見其要：

此次設局籌捐以來，支部與各分部頗得聯絡感情之效，故能集小款合成大宗，不至策應失時，實因金山大埠（即三藩市）為華僑出入必經之口岸，居交通要地，人才亦萃匯於此地者多。今後國內總機關對於應行事務，宜先認定金山支部為統一全美機關，畀其有完全權責，得統率各分部一致進行，綱領不紊，斷無不得指臂之助。此後凡遇美洲分部有與東京總機關接洽美洲黨務者，請將其籌商之事及尊處決定方略，即移知金山支部，使各分部無駢指之嫌，支部有通絡實力，團體固結，志念不濟……羅省埠（即洛杉磯）收條及來函已轉交矣，亦會將此欲謀統一之意，勸其勿同在一州另立門戶，致有力分則薄之虞；今可得其表同情，往後可無分歧之慮，亦黨務之大幸也。¹⁶

據此可知，林森於美籌款有成，三藩市為華僑出入美國之必經口岸，亦是要因，故以三藩市作為國民黨美洲總支部所在，即可就地利之便，匯合美洲各埠資訊及華僑。另外，三藩市未設為

¹⁶ 中國國民黨文化傳播委員會黨史館，〈林森陳達三上總理書〉，一般檔案，館藏號：一般 395/195。1914.9.12。

總支部前，羅省似亦有自立為總支部之意思。但經林森上書薦舉，東京本部最終仍選定三藩市為國民黨美洲總支部之所在。因此，回顧 1924 年國民黨改組前，三藩市總支部之成就，劉蘆隱在「駐美三藩市總支部報告」中，有極扼要的概述：

二年，總理命林子超來美，將國民黨改為中華革命黨，然既以用國民黨名義向美庭立案，未便更改，故只換中華革命黨證書而已。各埠同志，以全美黨務繁績，不可無總合之機關，遂公決組織一總支部於三藩市，以總全美黨務之成，並舉林子超長總支部，而總支部之成立，于是年始焉。林子超誠慎勤謹，遠近同志咸相翕服，在美三年，籌款討袁，共得百餘萬美金，成績昭著，至今猶為人稱道。惜子超卸事歸國後，一年餘，黨務無起色，幾無可述耳。八年八月，總理特派林直勉赴美，授以整理黨務之責。……林總幹事（直勉）以總支部所轄區域太廣，運用不靈，辦事難於周到，首從事於區域之劃分。……林熟知此散漫無際之區域極非所宜，且既稱美洲總支部，亦不應痛下美洲以外之機關也。故呈請本部將橫濱、澳洲、利物浦、非洲等之機關改劃歸本部直轄，而即以全美洲所屬各國，除加拿大另設總支部外，悉統轄於駐三藩市總支部。¹⁷

由此可見，國民黨美洲黨務之統合，林森及林直勉皆為要角，三藩市所以成為國民黨美洲總支部，林森之劃策尤為關鍵。¹⁸而林

¹⁷ 李雲漢、林養志，《中國國民黨黨務發展史料：組織工作（上）》，頁49。

¹⁸ 林直勉（1887-1941），原名培長，字紹軒，晚號魯直，廣東東莞人，1912年，任同盟會廣東支部長。1917年至1918年，任大元帥府秘書、參議。1920年任三藩市總幹事。1921年，任非常大總統孫中山秘書。1923年，受委為中國國民

森與林直勉先後奉孫中山之令，以特派員身分赴美整合黨務，其目的不外乎靈通機關，使三藩市總支部得以有效統籌美洲各埠黨部。至於，林森的「誠慎勤謹」，尤其在「籌款討袁」中可見其梗概。

2. 金援祖國的政治事業

除了整頓國民黨美洲黨務，林森赴美的首要任務在於策動美洲各埠黨部，予東京本部實際之金援。根據劉蘆隱「市的報告」所示，國民黨美洲黨部予中國革命的實際金援項目與額數（以美金計）如下：

辛亥三月二九日廣州之役，六萬餘元；武昌起義之役，十萬餘元；討袁之役，百餘萬元；救國儲金，八萬餘元；籌助內地同志恤難費，萬元；六年護法之役，五萬元；粵軍由閩回粵之役，三十萬元；集股款開設本黨印刷局，十萬餘元；討陳炯民之役，籌辦飛機十二架、軍需品、訓練飛行員，八十萬餘元，建設三藩市總支部，十萬元，共計三百六十餘萬元。¹⁹

若扣除建設三藩市總支部及開設本黨印刷局之費用，改組前國民黨美洲黨部金援中國革命事業，合計所得美金三百四十餘萬。其中，單向所得最高金援，推討袁之役，共計所得百餘萬元。據馮自由回憶，國民黨美洲黨務於林森主持下成績斐然。林森在美三年，籌款討袁所得共百萬餘美金，其金額遠在南洋籌款所得

黨臨時中央執行委員會候補委員。1924年，任大本營秘書兼大本營會計司司長、財政委員會委員。1926年，因涉及廖案被捕入獄，1927年出獄。詳細簡介，可參看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全文資料庫人物索引」。

¹⁹ 李雲漢、林養志，《中國國民黨黨務發展史料：組織工作（上）》，頁50。

之上，為海外各支部分部籌款所得之最。因此，馮自由以為民國三、四、五年，可堪稱是國民黨美洲黨務最光榮之一頁。²⁰為此，中華革命黨東京本部還特意通電，對林森與馮自由主持美洲黨務之貢獻加以表揚。²¹

尤可注意者，林森雖屬閩籍，但得以在粵籍華僑眾多的美洲僑社發揮關鍵性的影響，據筆者所集資料推斷，或有二因：一、孫中山特派赴美之身分；二、林森之人格感召。林森以孫指定特派身份赴美從事黨務活動，並得美洲華僑擁戴，可於八年林直勉赴美從事黨務活動之事為證。由此可見，美洲僑社對孫中山之領袖地位亦是相當肯定。至於，林森以人格感召為美洲僑社所肯定，除了上文提及「林子超誠慎勤謹，遠近同志咸相翕服」外，於馮自由回憶林森在美之工作及生活中亦可其梗概。²²甚至在1924年國民黨改組前，時任三藩市支部長黃子聰還特函總理，要求孫中山特派林森赴美指導黨務。²³如是，林森深得美洲僑社之厚愛，尤其

²⁰ 羅家倫，《革命文獻》，第五輯，頁58-76；另見李雲漢、林養志，《中國國民黨黨務發展史料：組織工作（上）》，頁49；又見鄒魯，《中國國民黨史稿》，第一冊，頁283。

²¹ 黃季陸，《革命文獻》，第四十五輯，〈總務部覆馮自由嘉勉在美籌款函〉，頁440。

²² 據馮自由記載：民五夏，子超先生自美東回舊金山就支部長職，黨務位置煥然一新。凡與各埠黨員通信，多親自執筆，不假人手，往往因指導黨務辦黨籌餉諸事，一信耗箋紙十數張，解說詳明，不厭其煩。黨員接信時，每見厚而重之大信封，莫不曰：「此林部長信也」，其見重如此。此外，林森於美時期常住於古里街（即苦力之音譯，為下層華僑聚居處），且美支部之正副部長均為義務的無給制，故用膳多寄食於少年中國報（國民黨於三藩市之黨報），生活刻苦。因此，孫中山還特令國民維持會（為籌款之用）贈林森三千美金作為生活費。及林森歸國前，美支部及國民維持會各贈大銀鼎一座，以彰勞績。羅家倫，《革命文獻》，第五輯，頁74-75。如上所述，可見孫中山對林森亦相當倚重，但何以如此還有待學者對林森做更多細緻之研究了。

²³ 中國國民黨文化傳播委員會黨史館，〈三藩市總支部長黃子聰上總理書〉，環

備受三藩市總支部黨員之推崇，於此可見其概矣。

三、改組對三藩市總支部的衝擊

（一）三藩市總支部對中國國民黨改組之疑慮

儘管，國民黨美洲各埠黨部皆能依循國民黨本部的改組而易。但國民黨美洲各埠在改組後，即牽連於國共合作所引發的左、右之爭。早在中華革命黨時期，因國民黨易名及誓約指印等問題，亦先後遭受美洲各埠黨員質疑，惟經林森遊說才告平息。²⁴因此，1924 年國民黨改組，同樣備受三藩市總支部所疑慮。三藩市總支部幹事陳耀垣曾對國民黨改組表示疑慮。²⁵然而，在答復陳耀垣疑慮時，孫中山仍堅持己見，謂：「當俄國革命之初，施行共產制度時，確與吾黨三民主義不同。至俄國現在所施行之新經濟政策，即是國家資本主義，與吾黨之三民主義相同。故非吾黨學俄國，實俄國學吾黨」。²⁶因此，三藩市總支部在孫的安撫下如期改組。事後，三藩市總支部長陳耀垣亦致電大會表示擁護。²⁷

然而，不僅有三藩市總支部對 1924 年國民黨改組表示疑慮。在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會議中，孫中山即明白指出海

龍路檔案，環 05557，1922-10-20。

²⁴ 參看黃季陸，《革命文獻》，第四十五輯，〈總務處覆林森皆是誓約指印意義函〉，頁438-440。

²⁵ 陳耀垣於 1922 年被委任為三藩市總支部支部長，中國國民黨文化傳播委員會黨史館，〈中國國民黨駐三藩市總支部黨字第四十六號通告〉，館藏號一般 415/19.12，1922-11-6。

²⁶ 羅家倫、黃季陸，《國父年譜》，下冊（臺北：近代中國出版社，1994），〈復陳耀垣對於國民黨改組意見〉，頁1425-1426。

²⁷ 中國國民黨文化傳播委員會黨史館，〈陳耀垣至大會電〉，漢口檔案，漢17150，1924-01。

外華僑對改組之疑慮，謂：「本黨舊同志驟聞共產黨員紛紛加入本黨消息，頓起懷疑，蓋恐本黨名義被彼利用也。對於此事懷疑尤甚者，為海外同志。本總理曾接到海外華僑數次函電詢問：此次改組是否為國民黨，為共產黨？如為改成共產黨，則華僑同志決不贊成」。²⁸據此可知，海外華僑對國民黨改組之疑慮應是普遍現象。更甚者，曾代理三藩市正支部長的馮自由，因不滿國民黨改組，於北京另行組織中國國民黨俱樂部，²⁹而被中央黨部開除黨籍。³⁰由此可見，1924年國民黨改組對華僑造成之疑慮與疏離，實不可低估。

（二）西山會議與三藩市總支部之分裂

據陳公博回憶，「西山會議」乃十四年國民黨內的一大事件，陳以為西山會議之構成可歸於：一、國民黨內的反共空氣；二、國民政府成立後的失意分子反攻。³¹對於西山會議的活動地域，《苦笑錄》僅提供了極簡要的資訊，謂：西山會議在「內地沒有什麼活動」，但「海外倒有幾處支部非常活躍」。³²雖然，文中沒有道出該活躍的海外支部有哪些，但三藩市總支部顯然即是活躍於支持西山會議的海外黨部之一。

²⁸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國國民黨第一、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會議史料（上）》（江蘇：江蘇古籍出版社，1986），頁21-22。

²⁹ 中國國民黨文化傳播委員會黨史館，〈中執會通告（147號）〉，漢口檔案，館藏號13212，1925。

³⁰ 中國國民黨文化傳播委員會黨史館，〈中執會通告（138號）〉，漢口檔案，館藏號4769，1925-4-24。

³¹ 陳公博，《苦笑錄：陳公博回憶（一九二五——一九三六）》（香港：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出版社，1979），頁46-52；另可參看鄒魯，《回顧錄》（南京：獨立出版社，1946），頁181-198。

³² 陳公博，《苦笑錄：陳公博回憶（一九二五——一九三六）》，頁49。

1925 年，鄒魯、林森等一部分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在滬召開第一屆第四次中央全會，並另設中央黨部與粵中央黨部相抗，是為國民黨改組後第一次正式分裂。³³對於鄒魯、林森等西山會議派之行徑，廣州中執委還特意通電海外，力斥上海民國日報的荒謬言論，冀對西山會議之宣傳給予反擊。³⁴但三藩市總支部顯然仍受粵滬之爭影響，尤以 1926 年，陳譚贊助西山會議案最具代表。

三藩市總幹事陳耀垣雖對國民黨改組表示疑慮。但自 1924 年 1 月 30 日，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結束後，三藩市總支部、舍路（即今西雅圖）、羅省等各埠黨部皆依循一全大會旨意相繼改組，並由陳耀垣呈請孫中山發給所屬各黨部職員之委任狀。³⁵同年，陳耀垣因少年中國晨報編輯去職，函廖仲愷代為物色才德兼優的同志，出任國民黨於三藩市機關報之編輯。³⁶雖然 1926 年，有陳譚贊助西山會議案發生，但部分主持三藩市總支部的「老同志」，對廖案、支援省港大罷工、支助星洲同志被逐、呈請中央將孫總理誕辰定為國定假日、及金援北伐等國內政事，皆有金援與政治參與。³⁷由此可知，陳譚贊助西山會議案發生前，三藩市總支部部分黨員仍忠於貫徹國民黨改組後的相關政策，甚至曾通電聯名附署贊成「中

³³ 有關西方會議之來龍去脈，可參看鄒魯的自述。榮孟源主編，《中國國民黨歷次代表大會及中央全會資料（上）》（北京：光明日報出版社，1985），頁 341-353。至於粵滬於全大會之紛爭，可參看王奇生，《黨員當權與黨爭：1924～1949 年中國國民黨的組織形態》（北京：華文出版社，2010），頁 98-103。

³⁴ 中國國民黨文化傳播委員會黨史館，〈中執會致海外各地黨部電稿〉，漢口檔案，漢 13671.2，1925-12-14。

³⁵ 中國國民黨文化傳播委員會黨史館，〈三藩市總支部上總理呈〉，環龍路檔案，環 06062，1924-02-18。

³⁶ 中國國民黨文化傳播委員會黨史館，〈陳耀垣致廖仲愷函〉，漢口檔案，館藏號 16486，1924-04-30。

³⁷ 中國國民黨文化傳播委員會黨史館，〈三藩市分部執監委員會致譚延闓函〉，漢口檔案，漢 9402.1，1927-01-28。

國國民黨中央各省聯席會議宣言及決議案」，共同反對西山會議，並電請汪精衛盡速銷假回部主持大計。³⁸

然而，亦有部分三藩市總支部黨員，對國民黨改組表示不滿，陳譚贊助西山會議案即是具體實例。應廣州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之際，三藩市總支部選派陳耀垣與譚贊二人為出席廣州二全大會代表。但陳譚二人抵達中國後，竟不到粵，反而親赴上海，並電匯三千元贊助西山會議。³⁹為此，廣州中央海外部即對陳譚二人提出彈劾，並要求嚴懲。⁴⁰但廣州中央監察委員以為，「陳譚二人久居海外，又以認識力薄弱之故」，對西山會議之煽惑「辨別不清」。因此，粵中監委對陳譚贊助西山會議案僅批示：「陳譚二人自應從寬，予以警告」，並設法「促其反省，限令兩個月內向本部聲明，與反動派脫離關係」。⁴¹此外，為避免三藩市僑眾受陳譚言論所惑，粵中央海外部先後派員赴美擔任少年中國晨報編輯，以矯正黨報視聽，⁴²並派遣馬典如為美洲黨務專員，就近視察及指導美洲黨務。⁴³

然而，粵中監委對陳譚二人之警告及派員赴美之舉措，似乎無助消弭三藩市總支部之分裂。譚贊仍是如故出席在滬舉辦的第

³⁸ 中國國民黨文化傳播委員會黨史館，〈中國國民黨中央各省聯席會議宣言及決議案〉，漢口檔案，漢 4991，1925-11。

³⁹ 中國國民黨文化傳播委員會黨史館，〈三藩市總支部陳耀垣贊助西山會議案〉，漢口檔案，漢 8872，1926-06-12。

⁴⁰ 中國國民黨文化傳播委員會黨史館，〈三藩市總支部陳耀垣贊助西山會議案〉，漢口檔案，漢 8872，1926-06-12。

⁴¹ 中國國民黨文化傳播委員會黨史館，〈三藩市總支部陳耀垣贊助西山會議案〉，漢口檔案，漢 8872，1926-06-12。

⁴² 中國國民黨文化傳播委員會黨史館，〈三藩市總支部陳耀垣贊助西山會議案〉，漢口檔案，漢 8872，1926-06-12。

⁴³ 中國國民黨文化傳播委員會黨史館，〈海外週刊〉，第二期，漢 6614.2，1926-03-29。

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並被選為滬中央執行委員，更於會間發表演說。⁴⁴至於，三藩市總支部雖在陳譚贊助西山會議案後，去函粵中央聲討西山會議。⁴⁵但三藩市總支部的紛爭並未就此平息，反於寧漢分立時期越演越烈。

四、寧漢分立下三藩市總支部的抉擇

中山艦事件後，汪赴走海外，蔣介石則因北伐節節推進，更突顯國共兩黨合作之矛盾。因此，國民黨中央黨部先後復發遷都之爭、倒蔣擁汪運動、上海四一二清黨及後來的寧漢分立。⁴⁶面對中國國民黨中央派系紛爭激化，海外黨部自然無法倖免，故三藩市總支部亦受此黨政之爭所波及。

根據「三藩市分部執監委員會致譚延闓函」指出，三藩市總支部與其所轄分部之紛爭，甚至漢中央海外部欲將三藩市總支部裁撤改組，皆源於美洲黨部「少數不良分子覬覦權勢」與海外部長彭澤民的「偏聽不明」。⁴⁷三藩市執監委員會先是哀嘆海外黨部

⁴⁴ 榮孟源主編，《中國國民黨歷次代表大會及中央全會資料（上）》，頁425、頁434。據筆者目前所閱資料，不見陳耀垣出席滬二全大會。但於1926年10月24日，陳耀垣曾致中央商民部函，以告美境華僑商會地址所在。然而，這不足以判別陳耀垣之政治意向，只能斷言在陳譚贊助西山會議案後，陳仍於三藩市總支部從事黨務。至於陳耀垣的政治意向，僅能待新資料的出現，才得以對此加以說明了。中國國民黨文化傳播委員會黨史館，〈本黨駐三藩市總支部陳耀垣等致中央商民部函〉，五部檔案，部2258，1926-10-24。

⁴⁵ 中國國民黨文化傳播委員會黨史館，〈海外週刊〉，第二期，漢口檔案，漢6614.2，1926-03-29。

⁴⁶ 有關中山艦事件至寧漢分立時期，蔣介石如何崛起及國民黨中央派系之演變，王奇生、金以林已有極精要之論述，本文不再複述。王奇生，《黨員當權與黨爭：1924～1949年中國國民黨的組織形態（修訂增補本）》，頁103-109；金以林，《國民黨高層的派系政治：蔣介石“最高領袖”地位是如何確立的》，頁26-50。

⁴⁷ 中國國民黨文化傳播委員會黨史館，〈三藩市分部執監委員會致譚延闓函〉，

之不幸，指控舍路與紐約分部借題發揮，召集不法全美臨時代表大會，進而質疑漢方海外部長彭澤民的辦黨能力。由於該長函所錄極其生動，故將之節錄於下：

現任海外部長彭澤民自就任以來，對於海外黨務建設少，破壞者多。古巴黨部風潮之烈，鈞會諒有所聞。而三藩市總支部所轄黨部又復軒然波起，不可收拾。彭部長非有意使其至此，而偏聽不明措置失當，以致弄成如此局面，實屬咎無可辭。自昨歲（1926）本黨最高機關不幸發生變化，我美洲黨部以遠隔海外未明真相，誠不免徬徨無主。然自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開會於廣州以後，三藩市總支部即發出通告尊重該會一切議決案件及由其產生之中央執行監察委員會，黨部意見自可復□一致。不謂舍路分部因三數私人嫌怨之故，竟借題發揮，提議召集臨時全美代表大會，冀實行其搗亂黨務計劃。紐約分部復從而和之，曾先後徵求各黨部意見。然受其愚惑之黨部不過廿餘，僅佔三藩市總支部所轄黨部四分之一數目。則公意如何可以概見。⁴⁸

隨後該函先是指責全美代表大會召開之不法，例舉總支部章程抨擊海外部長彭澤民的三項「偏聽不明」，控訴中央將三藩市總支部職員停職，及裁撤改組總支部之舉措不當，原函節錄於下：

舍路分部以贊成開臨時代表大會之黨部不足法定數目（按

漢口檔案，漢 9402.1，1927-01-28。

⁴⁸ 中國國民黨文化傳播委員會黨史館，〈三藩市分部執監委員會致譚延闓函〉，漢口檔案，漢 9402.1，1927-01-28。

照總支部章程，須有過半數黨部之請求，方得召開臨時代表大會），未得總支部照准，遂轉用瞞騙海外部之計劃，先由舍路分部廿一黨部名義向海外部請求。繼又由紐約分部廿五黨部名義向海外部請求。不知紐約等黨部，與舍路等黨部一而二，二而一。海外部不察受其矇混，以為合兩電以觀則請求開代表大會之黨部已符法定數目。因電總支部於兩個月內召集。此其偏聽不明者一也。

召集之命即下，總支部即行遵從，並指定以總支部黨所為會址。詎紐約分部懷著藉便營私之野心，又向海外部力爭會址應在紐約。海外部始終偏聽一面之詞，又有會址應有多數決定之電，然猶未指定紐約也。乃紐約分部竟藉是通電各黨部謂多數黨部決定在紐約開會，請派代表赴會。□其所謂多數黨部，據日後該分部來函所列共卅二處。姑無論此卅二處有未正式成立不能視為黨部，及有多數黨部通電聲明否認也，即以卅二處論，仍不及總支部所轄黨部之半，詎能冒稱多數？又況總支部代表大會，其召集手續須由總支部執行，故即使主張紐約開會之黨部確居多數，仍應呈請總支部核准。紐約分部又安能有此召集之權？乃紐約分部悍然為之，而不恤既通電各黨部於前，又自行組織籌備處……敝分部同志為維持正義起見，除通電該分部及各黨部力訴其非法外，同時致電海外部……（但）該電去後始終未蒙海外部回覆隻字，而紐約分部違法舉動又始終未受海外部加以制裁。此其偏聽不明之二也。

迨後會址問題由中央各省聯席會議定在羅省，而紐約分部竟致電海外部，謂會址如不在紐約，則我卅二黨部決不赴

會。此種要挾手段海外部不加申斥，斯亦已矣！詎不及數日海外部即來電稱中央決議停止總支部執監委員會職權，由敝分部聯同紐約舍路等九分部組織全美代表大會籌備處。……查總章第六章第四十三條，全省代表大會組織法選舉法及人數由執行委員會規定之，而海外總部支部實等於省。今海外部為妥協紐約分部起見，遂不惜破壞總章，以三藩市總支部為犧牲。蓋總支部職員之應受停止處分與否此另一問題。然不停之於前，不停之於後，而偏在紐約分部去電要挾之際，其用意所在，自可不言而喻。且停止總支部委員職權，則停之可也，且將總支部委員未受停職以前，所遵照黨章組織之籌備代表大會委員及所定之代表條例一概推翻之。因循少數黨部之私見不惜破壞黨章委曲遷就，恪守黨紀之謂何？敝分部同志，不敢應命，並經過一再電達鈞會陳其苦衷。……而海外部因循紐約等少數分部之私意，竟不恤破壞總章，以為遷就。此其偏聽不明者三也。⁴⁹

除了細數海外部長彭澤民的「偏聽不明」，該函對全美臨時代表大會召開與宣示表示異議，直指出席該會的黨部僅占三藩市總支部所轄分部的四分之一（十九處分部出席）。此外，該函對紐約分部捏造事實，據稱有五十一處分部擁護該會表示抗議。因此，該函對該臨時代表大會本身的違法提出抨擊，並例舉該會違法理由：一、接納不合法之代表，如準黨部外的非法組織團體，已破壞其自行所訂的代表資格條例；二、推選非法或已失效之黨員；

⁴⁹ 中國國民黨文化傳播委員會黨史館，〈三藩市分部執監委員會致譚延闓函〉，漢口檔案，漢 9402.1，1927-01-28。

三、違背中央指命，擅遷大會地址，由中央各省聯席會議選定之羅省自行改往屋崙（即加利福尼亞）。最後，該函於文末追述三藩市總支部之變遷歷程，強調「老同志」為追隨孫總理而抱以犧牲之決心，並細數三藩市總支部過去予中國國民黨改組後的金援與政治參與等種種努力。因此，來函的三藩市總支部中央執監委員會對三藩市總支部之瓦解不能諒解，且將紛爭緣由，皆歸咎於海外部長彭澤民的「偏聽不明」。⁵⁰

據上文引述長函，三藩市總支部中央執監委員會向武昌國府主席譚延闓的陳情，可將漢方海外部長彭澤民的「偏聽不明」歸納為：一、不查實情，受下矇騙；二、玩忽職守，怠於治事；三、自毀總章，執意用事；而促使以上事由之根本原因，在於彭澤民的「偏聽」乙方，「不明」事理。但值得玩味的是，同年三藩市總支部又去函中央恭賀中央遷都武漢。⁵¹此間，三藩市總支部究竟擁護漢方或寧方，實難以斷言，但可推斷該總支部之分裂，此即是具體實例也。然而，何以彭澤民一再執意行事，偏聽不明，甚至不惜解散三藩市總支部，限期特命紐約等處籌備全美臨時代表大會？對此紐約分部與武漢中央的往來函件，提供了極具價值的參考。在「紐約分部執委會常委趙鼎榮上中央海外部呈」中，紐約分部即明白表態，原文轉錄於下：

本分部今日開黨員特別大會，公決脫離南京政府，擁護武漢中央黨部國民政府。⁵²

⁵⁰ 中國國民黨文化傳播委員會黨史館，〈三藩市分部執監委員會致譚延闓函〉，漢口檔案，漢 9402.1，1927-01-28。

⁵¹ 中國國民黨文化傳播委員會黨史館，〈中央海外部遞中央黨部致送中央黨部來函三件〉，漢口檔案，漢 16958，1927-12-26。

⁵² 中國國民黨文化傳播委員會黨史館，〈紐約分部執委會常委趙鼎榮上中央海外

儘管，「三藩市分部執監委員會致譚延闓函」將三藩市總支部與其分部之紛爭，歸於「少數不良分子覬覦權勢」與海外部彭澤民的「偏聽不明」。但全美臨時代表大會的召開，顯然處於寧漢分立時期，紐約分部執委會常委趙鼎榮先致電武漢中央表示擁護，但事後趙鼎榮又一改前態轉而擁蔣。⁵³因此，紐約分部即刻致電武漢中央，要求革除趙鼎榮等人黨籍，並附上「紐約國民黨同志會第二次宣言」，再次強調該分部對武漢中央之擁護。⁵⁴為此，武漢中央還特電表彰紐約同志對武漢政府之贊助。⁵⁵由此可知，紐約分部仍為分裂之勢，但始終是擁護武漢中央之中堅，而彭澤民所以願意一再「偏聽不明」，此或為一要因也。

與此同時，國民黨中央亦出現海外部「雙部長」之怪象。1924年國民黨改組，原來並無海外部之設計。但在眾多海外同志要求下，乃得孫中山特許，於中央執行委員會下增設海外部，並以該部作為國民黨海外黨部最高機關，推舉林森為中統部部長。⁵⁶如是，陳耀垣與譚贊二人赴全國第二次代表大會之函件，即由時任

部呈》，漢口檔案，漢13895，1923-08-14。筆者考，原函日期確切註明民國十二年，但實誤。因該函寫明致海外部長彭澤民，國民黨未改組前本無海外部，且改組後海外部長先由林森出任，後因林森參與西山會議，而改彭澤民出任。因此，該函寫明致彭澤民，應當是西山會議後之事。此外，該函內容明白表示脫離南京政府，擁護武漢中央，即可肯定該函作出於寧漢分立時期。

⁵³ 中國國民黨文化傳播委員會黨史館，〈紐約國民黨同志會致中央海外部部長彭澤民函〉，漢口檔案，漢9199，1927-08-22。

⁵⁴ 中國國民黨文化傳播委員會黨史館，〈國民黨紐約分部致中央海外部函〉，漢口檔案，漢9198，1927-08-23。

⁵⁵ 中國國民黨文化傳播委員會黨史館，〈中央海外部七月份工作報告書〉，五部檔案，部10692，1927-08。

⁵⁶ 陳鵬仁，〈中國國民黨黨務發展史料——海外黨務工作〉（臺北：近代中國出版社，1998），頁1-2。

海外部長林森所核發。⁵⁷因此，何以陳譚二人願意電贊西山會議，此函或可概見端倪。然而，隨著林森假公北上，並被推舉為西山會議領袖。⁵⁸為此，廣州中央不得不另行推舉彭澤民代林森為海外部部長。但在彭澤民主持下的海外黨務轉於左傾，尤其以南洋區域之黨務最為動盪。⁵⁹如是，三藩市總支部與其所轄分部之紛爭，或可視為國民黨海外黨務左傾之實踐。至於國民黨紐約分部之左傾，於「為黨權運動擁護漢口中央黨部暨國民政府敬告本黨同志宣言」中，亦有著極為鮮明的表述：

親愛的同志們，本黨不幸，現在有了兩個中央，兩個政府了，到底誰是革命呢？（且看）汪精衛的演說。他說「什麼是反革命呢，請看總理遺囑，說革命的方法。是在喚醒民眾，同聯合以平等待我之民族。中國農民占百分之八十四，工人居次多數。所以喚醒民眾，就可以說是農工運動。聯合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就是反帝國主義。所以我們可以是，凡作農工運動，同反對帝國主義的，都是真革命。凡壓迫農工運動的，同不反對帝國主義的，都是反革命」。所以我們的黨，是代表大多數人民眾的公黨，不是兩個有兵權人的私黨。我們的黨，是用「民主集中」的制度，不是「一人獨裁」的制度。……蔣氏摧殘農工，私結英日，

⁵⁷ 中國國民黨文化傳播委員會黨史館，〈三藩市總支部致中央海外部部長林森函〉，漢口檔案，漢 3015，1925-10-13。

⁵⁸ 中國國民黨文化傳播委員會黨史館，〈海外部長林森上中職委函〉，漢口檔案，漢 02941.2，1925-09-16。

⁵⁹ 中國國民黨文化傳播委員會黨史館，〈南洋總支部朱赤霓致海外部函〉，漢口檔案，漢 11284.1，1925-11-27；另可參看：Yong, C.F., *The Kuomintang movement in British Malaya 1912-1949*, pp. 83-89.

都是反革命。……簡單一句話，我們要革命，還是不要革命呢？如果是要革命請大家聯合起來，打倒殘殺工人及黨員的蔣介石！打倒叛黨行私的蔣介石！打倒聯合軍閥及受帝國主義銀行家的蔣介石！打到南京私黨部及私人政府！擁護漢口中央黨部同政府！⁶⁰

據上引述的國民黨紐約分部宣言，其具體主張即：反蔣、聯合平等待我之弱小民族、與打倒帝國主義。若將之與武漢「中央海外部七月份工作報告書」及此時期國民黨中央之紛爭相加比對，可謂兩者實質上互為表裡。⁶¹因此，何以彭澤民一再偏聽不明，此又為一大要因也。

最後，隨著寧漢分立，南京中央先是推舉蕭佛成任中央海外部部長，⁶²爾後更是積極組織「海外部委員會」，由鄧澤如、林森、蕭佛成、周啟剛為委員，負責國民黨海外黨部的清黨事宜。⁶³因此，在國民黨中央出現兩個海外部長的情況下，為了強調己方的合法性，武漢中央海外部部長彭澤民偏聽紐約分部乙方，自屬必然。反之，三藩市總支部去函國府主席譚延闓，直指責紐約分部召開的全美臨時代表大會為非法，亦必有其然。

因此，馬典如在致武漢中央「美洲黨務調查專員致同志書」中，直指三藩市偽總支部為「西山餘孽」佔據，且得蔣介石偽中

⁶⁰ 中國國民黨文化傳播委員會黨史館，〈紐約國民黨同志會致中央海外部部長彭函〉，漢口檔案，漢 9199，1927-08-22。

⁶¹ 中國國民黨文化傳播委員會黨史館，〈中央海外部七月份工作報告書〉，五部檔案，部 10692，1927-08。

⁶² 中國國民黨文化傳播委員會黨史館，〈海外部委員會職員表〉，五部檔案，部 10841，1926。

⁶³ 中國國民黨文化傳播委員會黨史館，〈中央海外部宣傳科致中央婦女部函〉，五部檔案，部 13041，1927-11-29。

央暗中支助，故「三藩市偽支部根本上不能存在」的報告，並非憑空捏造。⁶⁴反之，三藩市總支部中央執監委員會呈南京國府主席譚延闓之函件，顯然得到了實際回應，且於無形的自我表態中轉向南京中央。如是，相較於三藩市總支部將該總支部與其所轄分部之紛爭，歸咎於彭澤民的「偏聽不明」與「少數不良分子覬覦權勢」，若以紐約分部與武漢中央的往來函件相加比對，將三藩市總支部與舍路、紐約分部之紛爭視為武漢中央與南京中央紛爭之延伸，亦未嘗不可。因此，1926 年廣州中央召開的聯席會議，顯然沒法整頓三藩市總支部的內部紛爭，反而更是激化了三藩市總支部與其所轄分部之分裂，進而轉化為國民黨中央派系之爭中，武漢與南京各方相互拉攏之政治資源。

五、結論

改組前國民黨美洲黨部與國民黨中央的互動關係有二特色。一、國民黨美洲黨務的改革皆奉孫中山意旨為主旨。孫特派林森、林直勉赴美改革黨務，即以強化黨組織為要，三藩市支部更是於林森主持下被最終被確立為美洲總支部所在。林直勉亦出於靈活總支部之需，對三藩市總支部與所轄分部進行改組，以強化總支部與各支部、分部、區分部之聯繫。二、國民黨美洲黨務受國民黨中央直接影響。當林森被調回中國後，國民黨美洲黨部日形渙散，惟八年孫特命林直勉赴美，國民黨美洲黨務才相繼重整，並積極響應黨中央之主張。但林直勉返國後，美洲黨務又趨於沒落之勢，故時任部長黃子聰特函呈孫中山，要求派遣特員來美支援黨務。因此，改組前三藩市總支部，基本奉行孫中山意旨作為黨

⁶⁴ 中國國民黨文化傳播委員會黨史館，〈美洲黨務調查專員致同志書〉，漢口檔案，漢 13896.1，1927-08-20。

務發展路線，而貫徹與執行黨務改組者，即是孫指定的特派員。然而，孫中山逝世後，為平息陳譚贊助西山會議案於三藩市總支部引發之紛爭，粵中央亦曾特派馬典如為赴美特派員就近指導黨務。但馬典如赴美未使三藩市總支部之紛爭平息，反而更激化促成該總支部與舍路、紐約分部之紛爭。如是，相較林森、林直勉、馬典如三人皆以中央特派員身份赴美整頓黨務，其成效有如此顯著之別，關鍵或在於粵方或漢方之政治感召，仍不及孫中山於美洲僑社之感召之故也。

儘管，改組後的中國國民黨，將黨的基礎定調為「由國外而移到國內」。⁶⁵但據上文所論，國民黨中央的政治動向，仍牽動著海外黨部之發展。若以三藩市總支部為例，無論是1925年西山會議與廣州中央之分裂，抑或1927年的寧漢分立，該總支部皆處於國民黨中央派系之爭影響之下。雖然，國民黨改組並沒有失去原來早在海外建立的基礎，且中央海外部隨著改組更是擴展了其所管轄的海外黨部。⁶⁶但國民黨改組後的派系之爭，同時亦分化了國民黨於海外原有的組織基礎，如同南洋總支部之裁撤及英屬新馬海外黨部之紛爭，⁶⁷及三藩市總支部雖於改組後逐漸增設了許多支、分部，但卻也同時因為國民黨中央的派系之爭，而日趨分裂，且險些瓦解。

此外，國民黨海外黨部與國內一般黨部的最大區別即是群眾基礎。國民黨改組後，即標識以國內一般群眾，特別是農、工、小資產階級為其群眾基礎。但國民黨海外黨部不論是否改組，皆

⁶⁵ 李雲漢，《中國國民黨黨務發展史料——中央常務委員會黨務報告》（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1995），頁72。

⁶⁶ 李雲漢，《中國國民黨史述》，第二編（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1994），頁521-524。

⁶⁷ Yong, C.F., *The Kuomintang movement in British Malaya 1912-1949*, pp. 83-89.

必須以華僑社會為其活動空間，並以華僑作為其群眾基礎。如是，三藩市總支部不論是否歷經改組，皆能以實際之金援方式贊助國內的政治事業，此即國民黨海外黨員於華僑社會運動之成果，亦是國民黨海外黨部與國內一般黨部的最大區別。但海外黨部亦非全是經濟自主，其關鍵所在仍是海外黨部黨員之構成基礎。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中央海外部工作報告」，有較為具體的描述：

講到歐洲方面的黨務，和美洲南洋又不同。因為歐洲辦黨的，多是留學生，和工人，所以辦黨的人材，非常充足；現在英國、法國、德國……通通都有支部的設置，但是經濟方面，卻很困難，歐洲的黨員，多是學生和工人，哪些學生和工人，那裏有錢拿來辦黨呢？雖然是有錢，也是不多的了，因為經濟的關係，還不能盡量發展。⁶⁸

因此，有別於北伐後，國內國民黨省黨部一再受到省政府之牽制。⁶⁹國民黨海外黨部與國內一般黨部之區別，其關鍵在於部分海外黨部之經濟較能自主。儘管武漢中央一再訓斥為西山會議派佔據的三藩市總支部，應予紐約分部經濟上之贊助。⁷⁰但三藩市總支部對此不加理會，其根本原因即：三藩市總支部的「老同志」皆是當地華僑，且多出身商賈，故該總支部並不需武漢中央的經濟接濟，仍能免於經濟拮据而造成的黨務難題。⁷¹因此，相較於國

⁶⁸ 陳鵬仁，《中國國民黨黨務發展史料——海外黨務工作》，頁4-5。

⁶⁹ David Tsai, "Party-Government Relations in Kiangsu Province, 1927-1932," Selected Papers from the Center for Far Eastern Studies, no. 1, 1975-76., pp. 85-118.

⁷⁰ 中國國民黨文化傳播委員會黨史館，〈中央海外部七月份工作報告書〉，五部檔案，部10692，1927-08。

⁷¹ 國民黨馬來亞黨部亦有像似之情形，可參見：Yong. C.F., The Kuomintang movement in British Malaya 1912-1949, pp. 83-103.

民黨省黨部，海外黨部於政治的操作上顯然更具有自主性。

舉上，儘管三藩市總支部表面上仍能順應國民黨的改組而易，但隨著國民黨中央派系之爭的激化，該總支部即呈現不可避免的分歧。因此，國民黨的改組，其組織雖於國內、外皆有顯著之進展，但其所衍生之派系紛爭對其國內、外的黨部基礎亦起著分化作用。另外，國民黨海外黨部，除了對國內政治事業與經濟建設有所建樹，對於國民黨中央的派系之爭亦成了不可或缺，為各方勢力相互拉攏及運動的政治資源。如是，何以國民黨美洲黨務曾有擁胡派與擁汪派之分，⁷²爾後又有改組派於美洲東部與南京中央海外部展開的黨務組織爭奪戰，⁷³其脈絡淵源或可從 1924 年國民黨改組對美洲黨務所造成之衝擊說起。

⁷² 麥謙禮，〈從華僑到華人——二十世紀美國華人社會發展史〉（香港：三聯書店，1992），頁186-200、212-217、228-230。

⁷³ 張順良，〈改組派與國民黨中央海外黨務組織爭奪戰初探〉，《花蓮教育大學學報》23（花蓮，2006），頁331-356。

徵引書目

一、文獻史料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國國民黨第一、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會議史料（上）》，江蘇：江蘇古籍出版社，1986。

李雲漢，《中國國民黨史述》，第二編，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1994。

李雲漢，《中國國民黨黨務發展史料——中央常務委員會黨務報告》，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1995。

杜元載，《革命文獻》，第六十五輯，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1974。

陳鵬仁，《中國國民黨黨務發展史料——海外黨務工作》，臺北：近代中國出版社，1998，頁 1-2。

黃季陸，《革命文獻》，第四十五輯，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1956。

羅家倫，《革命文獻》，第五輯，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1954。

羅家倫、黃季陸，《國父年譜》，下冊，臺北：近代中國出版社，1994。

鄒魯，《中國國民黨史稿》，第一冊，北京：中華書局出版，1960。

中國國民黨文化傳播委員會黨史館，〈林森陳達三上總理書〉，館藏號 395/195。

中國國民黨文化傳播委員會黨史館，〈三藩市總支部長黃子聰上總理書〉，環龍路檔案，環 05557，1922-10-20。

中國國民黨文化傳播委員會黨史館，〈中國國民黨駐三藩市總支部黨字第四十六號通告〉，館藏號一般 415/19.12,1922-11-6。

中國國民黨文化傳播委員會黨史館，〈紐約分部執委會常委趙鼎榮上中央海外部呈〉，漢口檔案，漢 13895，1923-08-14。

中國國民黨文化傳播委員會黨史館，〈陳耀垣至大會電〉，漢口檔案，漢 17150，1924-01。

中國國民黨文化傳播委員會黨史館，〈三藩市總支部上總理呈〉，環龍路檔案，環 06062，1924-02-18。

中國國民黨文化傳播委員會黨史館，〈陳耀垣致廖仲愷函〉，漢口檔案，館藏號 16486，1924-04-30。

中國國民黨文化傳播委員會黨史館，〈中執會通告（147 號）〉，漢口檔案，館藏號 13212，1925。

中國國民黨文化傳播委員會黨史館，〈中執會通告（138 號）〉，漢口檔案，館藏號 4769，1925-4-24。

中國國民黨文化傳播委員會黨史館，〈海外部長林森上中職委函〉，漢口檔案，漢 02941.2，1925-09-16。

中國國民黨文化傳播委員會黨史館，〈三藩市總支部致中央海外部長林森函〉，漢口檔案，漢 3015，1925-10-13。

中國國民黨文化傳播委員會黨史館，〈南洋總支部朱赤霓致海外部函〉，漢口檔案，漢 11284.1，1925-11-27。

中國國民黨文化傳播委員會黨史館，〈中國國民黨中央各省聯席會議宣言及決議案〉，漢口檔案，漢 4991，1925-11。

中國國民黨文化傳播委員會黨史館，〈中執會致海外各地黨部電稿〉，漢口檔案，漢 13671.2，1925-12-14。

中國國民黨文化傳播委員會黨史館，〈海外週刊〉，第二期，漢口檔案，漢 6614.2，1926-03-29。

中國國民黨文化傳播委員會黨史館，〈三藩市總支部陳耀垣贊助西山會議案〉，漢口檔案，漢 8872，1926-06-12。

中國國民黨文化傳播委員會黨史館，〈本黨駐三藩市總支部陳耀垣等致中央商民部函〉，五部檔案，部 2258，1926-10-24。

中國國民黨文化傳播委員會黨史館，〈三藩市分部執監委員會致譚延闓函〉，漢口檔案，漢 9402.1，1927-01-28。

中國國民黨文化傳播委員會黨史館，〈美洲黨務調查專員致同志書〉，漢口檔案，漢 13896.1，1927-08-20。

中國國民黨文化傳播委員會黨史館，〈紐約國民黨同志會致中央海外部部長彭澤民函〉，漢口檔案，漢 9199，1927-08-22。

中國國民黨文化傳播委員會黨史館，〈國民黨紐約分部致中央海外部函〉，漢口檔案，漢 9198，1927-08-23。

中國國民黨文化傳播委員會黨史館，〈中央海外部七月份工作報告書〉，五部檔案，部 10692，1927-08。

中國國民黨文化傳播委員會黨史館，〈中央海外部宣傳科致中央婦女部函〉，五部檔案，部 13041，1927-11-29。

中國國民黨文化傳播委員會黨史館，〈中央海外部遞中央黨部致送中央黨部來函三件〉，漢口檔案，漢 16958，1927-12-26。

中國國民黨文化傳播委員會黨史館，〈海外部委員會職員表〉，五部檔案，部 10841，1926。

二、專書著作

李盈慧，《華僑政策與海外民族主義（1912-1949）》，臺北：國史館，1997。

李雲漢、林養志，《中國國民黨黨務發展史料：組織工作（上）》，臺北：國民黨黨史會出版，1993。

金以林，《國民黨高層的派系政治：蔣介石“最高領袖”地位是如何確立的》，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

麥謙禮，《從華僑到華人——二十世紀美國華人社會發展史》，香港：三聯書店，1992。

陳公博，《苦笑錄：陳公博回憶（一九二五——一九三六）》，香港：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出版社，1979年。

鄒魯，《回顧錄》，南京：獨立出版社，1946。

三、論文著作

張順良，〈改組派與國民黨中央海外黨務組織爭奪戰初探〉，《花蓮教育大學學報》，23，花蓮：花蓮教育大學，2006，頁331-356。

陳國維，〈抗戰前中國國民黨駐美黨部與國內政局〉，南投：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歷史學系研究所，2010，碩士學位論文。

四、外文資料

Chen San-Ching, Communist-Leftist Control of the European Branch of the Guomindang, 1923-1927, Modern China, Vol. 22 No. 1, January, 1996, pp. 62-91.

Tsai David, "Party-Government Relations in Kiangsu Province, 1927-1932," Selected Papers from the Center for Far Eastern Studies, no. 1, 1975-76., pp. 85-118.

Yong, C. F. The Kuomintang movement in British Malaya 1912-1949. Singapore: Singapore University Press, 1990, pp. 83- 105.

Reorganization and Cliques Struggle: A Case Study of Relationship between KMT Central Branch with San Francisco Branch, 1924-1927

Tan, Ying-xian^{*}

Abstract

Reorganization of KMT had aroused cliques struggle in whole KMT history, and that issues of study had focus on KMT Central branch than Overseas branch. Therefore, this study will discus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KMT Central branch and Overseas branch, and focus on case of San Francisco branch. In the beginning, this article will describe the development of KMT San Francisco branch, pointed out Lin Sen as a crucial man. Secondly, this study will discuss how KMT San Francisco branch impact by cliques struggle of KMT Central branch in the Revolution Age, and revealed how Overseas Chinese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KMT Overseas branch.

Keywords: overseas branch, San Francisco branch, Xi shan hui yi, Ning han fen li, cliques, Overseas Chinese

^{*} Master student at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Department of History.